

文物与考古:西周考古专题

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所见人群构成及文化融合现象

付仲杨,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2017—2023年在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作坊遗址共清理西周墓葬31座。这批墓葬的形制和葬式等葬俗各有特点,形制上有竖穴土坑墓(29座)和灰坑葬(2座);有俯身直肢葬和仰身直肢等葬式。竖穴土坑墓中包括一椁一棺墓15座,单棺墓8座,无棺6座。同时,部分墓葬还存在头蹄葬、腰坑殉狗、二层台殉人以及葬牲等现象。墓主应由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和底层陶工等多种人群构成,墓主人群可能分属不同族群。多座墓葬存在多种文化因素,表明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周文化在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不仅传承和吸收中原殷商文化,还将西北地区戎狄文化融合进来。大原村遗址内的墓葬为华夏族群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见证。此外,墓葬所见多元人群与等级差异,体现出一种由权力统一管理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并非由血缘所维系,与《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所记“世工世族”存在差异。

关键词:西周;墓葬;人群构成;文化融合

作者简介:付仲杨,男,历史学硕士,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周考古、数字考古技术应用与研究;徐良高,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考古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5)02-0062-17 **收稿日期:**2024-03-06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5.02.009

2017—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持续对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进行发掘(见图1),共清理西周墓葬31座,编号为M1-M4、M6、M10-M35(见图2)。^①其中包含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墓葬1座、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墓1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4座、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墓1座、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墓13座、具体年代不明墓11座。该制陶遗址以烧制夹砂褐陶分裆疙瘩鬲为主,产品相对单一且专业化水平较高,存在统一管理的官营属性,并呈现出“工、居、葬合一”聚落布局形态。^②蔡宁等指出“居葬合一”指居址遗存与墓葬同处一处,共时存在,两类遗存互有打破关系,属于同一特定人群。^③故在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发现“居葬合一”现象很可能代表着墓主人就是这类手工业的生产者。虽然制陶遗址的主体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而发掘的31座西周墓葬中有部分墓葬年代早于制陶遗址,但是依然对讨论该区域内的多元人群构成和关系存在价值,故在本文中也将会做总体考察。^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陕西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AKG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项目“丰镐遗址考古勘探与试掘”(项目编号:2024KGYJ005)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沣西大原村制陶遗址2017~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2020~202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南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2020~202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4年第2期。

③ 蔡宁等:《陕西周原云塘制骨作坊“居葬合一”论》,《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

④ M3、M10、M11、M14、M26和M35等6座墓葬,除M35和M14被与制陶遗址相关的灰坑打破外其余均与制陶遗址无打破关系,其年代也均早于制陶遗址。M2和M6等14座年代与制陶遗址年代大致同时的墓葬以及M1和M4等11座具体年代不明的西周墓葬均分布在制陶遗址范围内,且均与陶窑无打破关系,但我们认为它们可能与制陶遗址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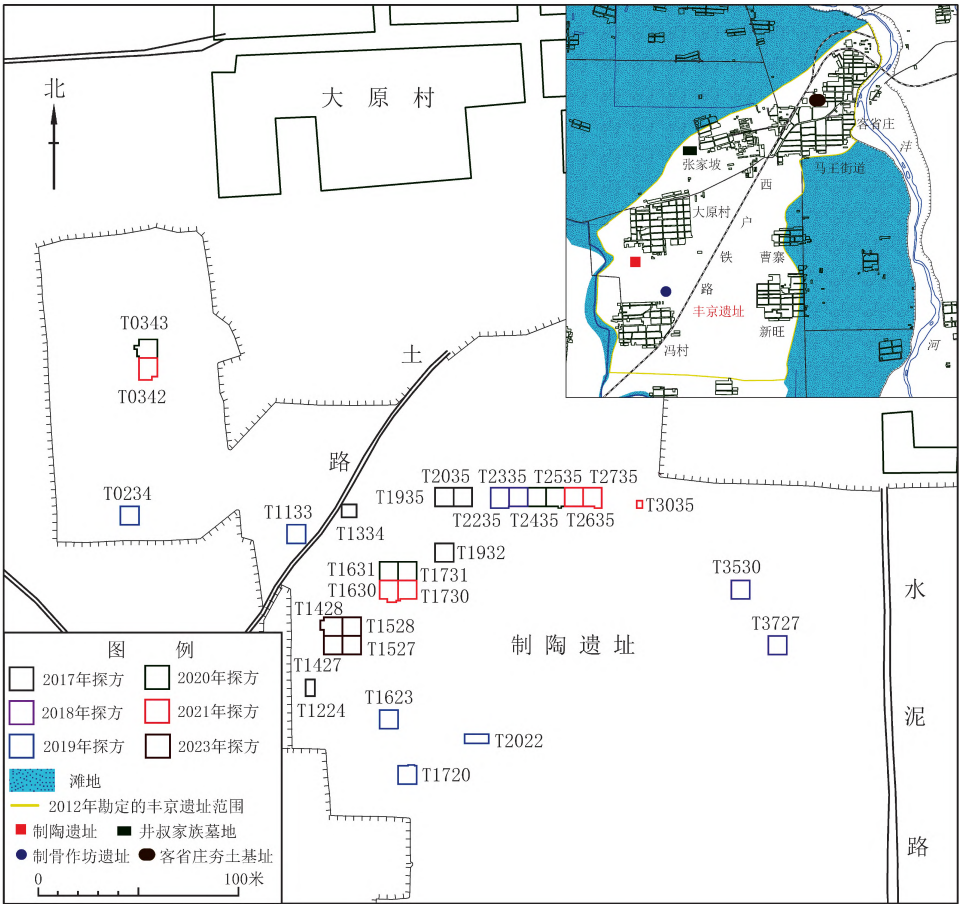


图 1 2017—2023 年大原村制陶遗址发掘探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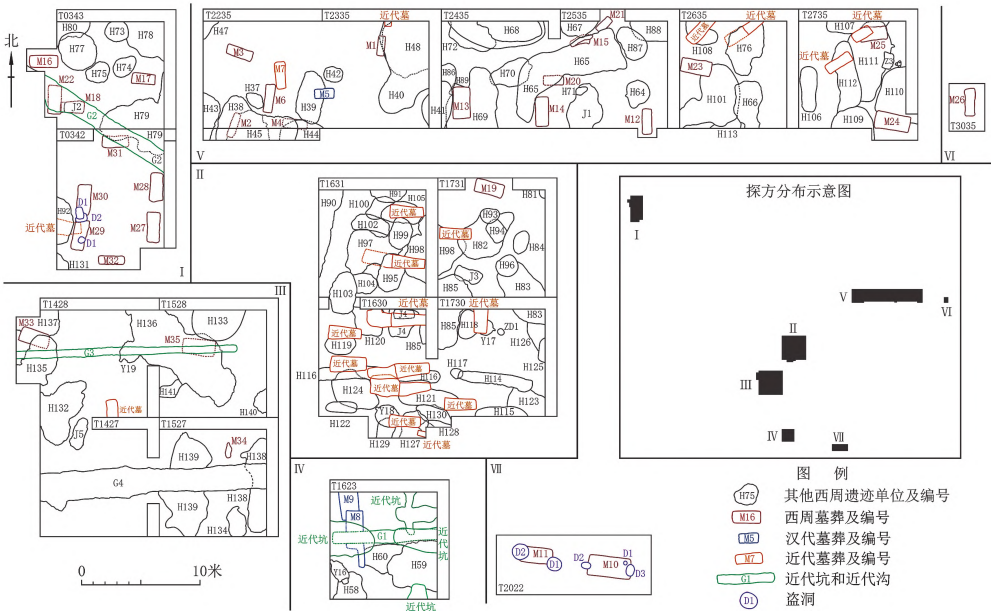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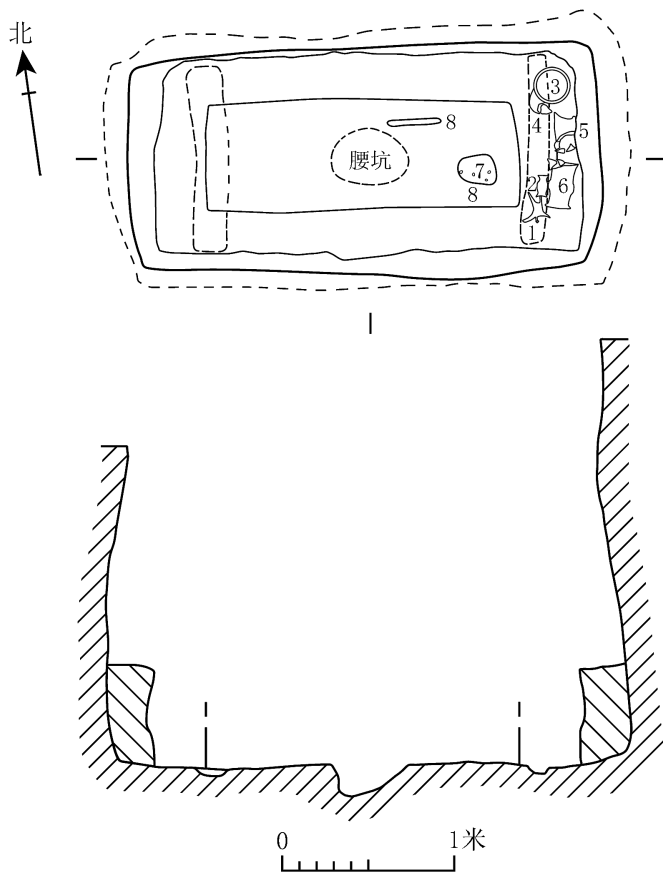
图 2 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分布图

一、墓葬概况

(一) 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墓葬
仅 1 座, M35。

M35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位于 T1528 西北部,叠压于 H136 下,打破生土。

墓向 98 度。墓坑口小,底略大。墓口距地表深约 1.6 米,现存墓口长约 2.76、宽约 1.17~1.38 米;墓底长约 3.19、宽约 1.28~1.6,墓中间深 2.04~2.66 米(见图 3)。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较紧密。墓壁较直,往下稍往外扩,熟土二层台宽 0.08~0.34、高约 0.58 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棺木已朽,但棺上可能髹漆,发现有黑色和红色漆皮碎块,棺长约 1.83、宽约 0.66 米,高度不详,棺底有朱砂。人骨保存较差,呈粉末状,依稀能辨出头骨和右肱骨分布范围,人骨头朝东,面向、葬式、性别和年龄不明。椁长约 2.49、宽约 1.22,残高约 0.59 米,椁底东、西两端各有一剖面呈半圆形横垫木,西端横垫木长约 1.08、宽约 0.19,厚约 0.06 米;东端横垫木长约 1.1、宽约 0.12,厚约 0.06 米。椁底中部有一椭圆形腰坑,长约 0.45、宽约 0.32,深 0.17 米。坑内发现少量兽骨,呈粉末状,可能为狗骨。



1.铜爵(M35:1) 2.铜斛(M35:2) 3.陶簋(M35:3) 4.陶罐(M35:4) 5.陶鬲(M35:5) 6.陶尊(M35:6) 7.贝(M35:7) 8.人骨

图3 M35 平剖面图

墓中填土有殉牲,在距墓口约 1.3 米东北部填土中殉葬有 1 只狗,狗骨保存情况较差。墓内共出土 2 件铜器、4 件陶器和 5 枚贝等 11 件器物,其中铜器和陶器均放置于椁内东侧棺椁之间,4 枚贝出在人骨头骨范围内,可能为口含,另有 1 枚贝出于腰坑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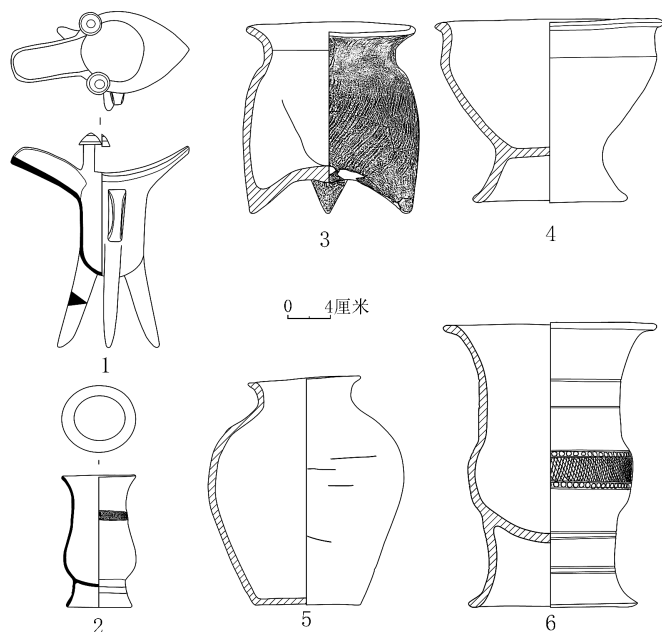
铜器 共 2 件。

铜爵 1 件。M35:1,侈口,槽形流上扬,尖尾上翘,口缘前部近流处立圆菌状双柱,腹身筒状深腹,圜底,三棱刀状足,足尖外撇,三足面均有一竖向棱脊,一足上侧腹中部置竖向半环形鏊,鏊面两侧棱角分明。素面,腹部有两处补铸痕迹。通高 20、流尾间距约 16.6 厘米,重 756.6 克(见图 4-1、图 5-1)。

铜斛 1 件。M35:2,器体扁圆,侈口,束颈,深腹下垂,圜底,圈足较高;口、腹身和足横截面呈椭圆形;颈部饰一周云雷纹,圈足上饰两周凸弦纹。颈部有一处补铸痕迹。口长径 6.9、短径 6.2、通高 12.4 厘米,重 230.8 克(见图 4-2、图 5-2)。

陶器 共 4 件。

陶鬲 1 件。M35:5,已修复完整,夹砂灰褐陶。侈口,圆唇,卷沿,束颈,颈部较长,联裆,三足之间的近裆处腹部向里瘪陷,锥状足。沿外和颈部有绳纹被抹痕迹,颈部以下饰绳纹。口径 15.8、腹径 20.4、高 23.1 厘米(见图 4-3、图 5-5)。



1.铜爵(M35:1) 2.铜解(M35:2) 3.陶鬲(M35:5) 4.陶簋(M35:3) 5.陶罐(M35:4) 6.陶尊(M35:6)

图 4 M35 随葬器物



图 5 M35 随葬器物照片

陶簋 1 件。M35:3,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敞口,卷沿,尖圆唇,粗颈,腹颈分界较明显,弧腹,圜底,高圈足。素面。口径 22.8、腹径 20.4、底径 14.5、高 18.7 厘米(见图 4-4、图 5-3)。

陶罐 1 件。M35:4,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小侈口,圆唇,卷沿,细颈,圆肩,深腹,平底。肩部和腹部有几道不规整的压划凹弦纹,纹道很细,首尾不相接。口径 10.5、肩径 20.4、底径 9.7、高 23.1 厘米(见图 4-5、图 5-4)。

陶尊 1 件。M35:6,为仿铜尊形式,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敞口,卷沿,圆唇,粗长颈,鼓腹,圜底,高圈足。颈部饰两周凹弦纹,腹部上、下饰两组各两周凹弦纹,凹弦纹之间饰圆圈纹,两组纹饰之间饰斜方格纹,圈足饰两组各两周凹弦纹。口径 19.9、腹径 15.4、底径 15.8、高 30.4 厘米(见图 4-6、图 5-6)。

贝 5 枚。M35:7-1,稍残,背面有孔。残长约 2 厘米。M35:8,背面有孔。长约 2.1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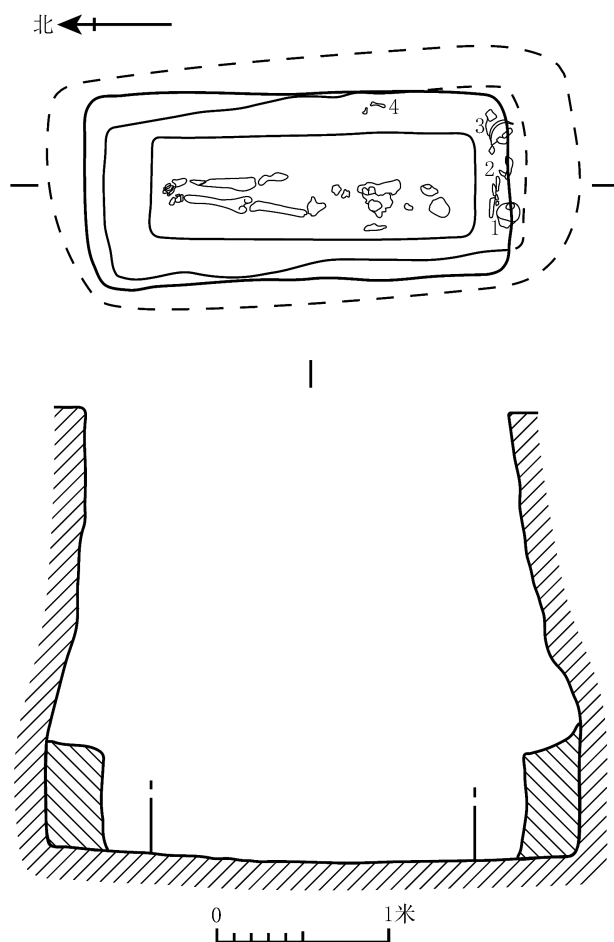
出土陶簋和陶鬲分别与张家坡第二期墓葬 M16 出土的陶簋和陶鬲相似,报告认为第二期的年代约

为西周初年至成康时期。^① 出土陶鬲也与《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Aa型I式陶鬲96SCMM5:1相似,报告认为第二期墓葬年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②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M35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

(二)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墓葬

仅1座,M14。

M1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开口于第3层下,被H65打破,打破生土。墓向180度,墓坑口小,底略大,墓口距地表约1.02、墓口长2.49、宽1.05-1.14米;墓底长约3.08、宽约1.44,墓深约2.64米(见图6)。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较紧密。墓壁上部较直,下部稍往外扩,熟土二层台宽约0.3-0.32,高约0.6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2.46、宽0.98,高约0.6米;棺长1.88、宽0.61米,高度不明。椁盖板为东西横向铺设,搭于东西二层台上。北部可辨出3块板灰痕迹,每块长约1.15、宽约0.2米。椁底未见有横垫木和腰坑。人骨保存较差,呈粉末状,仅能辨出头骨、椎骨和下肢骨。墓主人骨头朝南,俯身直肢,面向、性别和年龄不详。



1.陶罐(M14:1) 2.陶鬲(M14:2) 3.陶簋(M14:3) 4. 兽骨(M14:4)

图6 M14平剖面图

椁盖中部东侧和南部棺椁之间有葬牲现象,东侧为猪骨。南部棺椁之间随葬1件陶罐、1件陶鬲和1件陶簋,为所有陶质随葬品。

陶鬲 1件。M14:2,已修复完整,夹砂褐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鼓腹,联裆,三足之间的近裆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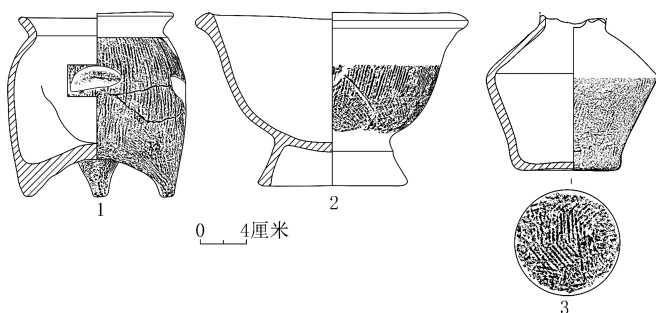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腹部向里瘪陷,锥状足。裆部上方有罍。颈部以下饰绳纹。口径 13.4、腹最大径 15.5、高约 16 厘米(见图 7-1)。

陶簋 1 件。M14:3,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敞口,三角形厚唇,斜鼓腹,圜底,圈足。腹部饰交错绳纹,圈足上饰一道凸棱。口径约 23.7、底径 13、高 15 厘米(见图 7-2)。

陶罐 1 件。M14:1,口部残,夹砂褐陶。小口,束颈,圆肩,微凹底。腹部及罐底饰绳纹。肩径 14.8、底径 9.1、残高 13.3 厘米(见图 7-3)。



1.鬲(M14:2)2.簋(M14:3)3.罐(M14:1)

图7 M14出土陶器

出土陶鬲与张家坡第二期 A 型Ⅲb 式陶鬲 M145:2 相似,报告认为第二期年代相当于昭穆时期。^① 出土陶簋与《1997 年沔西发掘报告》第三期陶簋 97SCMMH16:2 相似,报告认为第三期年代约相当于成王后期至康、昭王时期。^②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M14 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三) 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葬

共 4 座,分别是 M3、M10、M11 和 M26。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0、M11 均位于 T2022 内。均开口于第 2 层下,打破生土层。M26 位于 T3035 中部。

M10 和 M11 详细情况已经发表。^③ M10 的棺内西北角发现随葬 1 件折断且被砸弯铜戈,在棺外四周,发现蚌鱼、蚌泡、贝等,上附着有红色朱砂,应为棺饰,在 D1 底部还发现 1 件带流平底罐。另外,在填土中有头蹄葬现象,即将牛头与牛蹄、马蹄放置在一个挖掘于墓葬填土的坑中。在填土中和二层台上有葬牲现象,以葬羊居多。墓中共出土铜戈 1 件(见图 8-1)、带流陶罐 1 件(见图 8-2)、残玉片 1 件、骨器 1 件、蚌泡 1 件、贝 3 枚、蛤蜊 1 件等 9 件器物。



1.铜戈(M10:1)2.陶罐(M10D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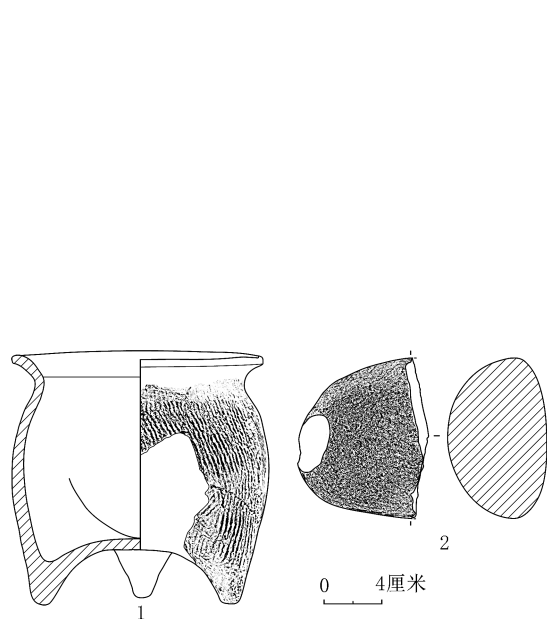
图8 M10出土铜戈和带流陶罐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0、368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 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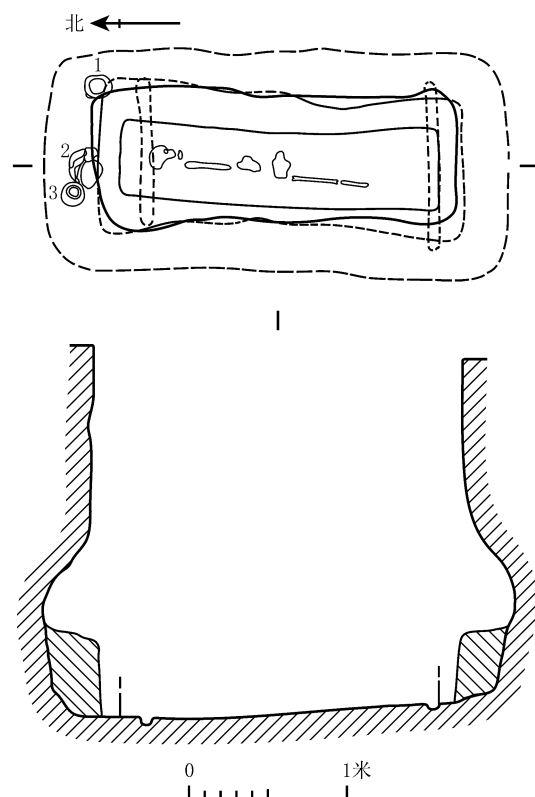
③ M10 和 M11 详细情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南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0 年第 4 期。

M11 棺外四周发现蚌鱼和贝等,应为棺饰。在 D1 中发现 1 件陶鬲和 1 件残卵石块,可能是墓中的随葬品。另外,在填土中和二层台上有葬牲现象,以葬羊居多。墓中共出土陶鬲 1 件(见图 9-1)、贝 18 枚、蚌鱼 75 件和残卵石 1 件(见图 9-2)。



1.陶鬲(M11D1:01) 2.卵石(M11D1:02)

图9 M11出土陶鬲和卵石块



1.陶鬲(M26:1) 2.陶簋(M26:2) 3.陶罐(M26:3)

图10 M26平剖面图

M26 竖穴上坑墓。开口于第3层下,打破生土。墓向0度,墓坑口小,底略大。墓口距地表约1.06、墓口长约2.29、宽约0.8;墓底长2.94、宽1.47,墓深2.17-2.37米(见图10)。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较紧密。墓壁上部较直,下部在二层台上约0.65米处向外掏挖约0.2-0.26米,然后向内收,熟土二层台由细密的黄生土夯打而成,宽0.27-0.35、高约0.6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约2.31、宽约0.83米,高约0.47;棺长约2.03、宽约0.47米,高度不明。椁盖板为东西横向铺设,搭于东西二层台上。据遗留板灰痕迹,椁盖板宽约0.15-0.2米。椁底南、北两端各有一剖面呈半圆形的横垫木,北端横垫木长约0.93、宽约0.06、厚0.05米;南端横垫木长约1.06、宽约0.07、厚约0.03米。墓底无腰坑。棺内有一具人骨,保存状况较差,仅存部分骨末,可大致辨出头骨、椎骨和部分下腿骨的范围,墓主人骨头朝北,面向东,直肢葬,性别和年龄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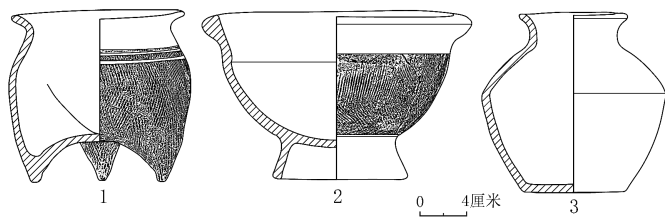
在北二层台上随葬1件陶鬲、1件陶簋和1件陶罐,为墓内全部陶质随葬品。

陶鬲 1件。M26:1,已修复完整,夹砂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鼓腹,弧裆,圆锥状足。颈部以下饰两周凹弦纹和绳纹。口径14.6、腹径15.4、高约14.6厘米(见图11-1)。

陶簋 1件。M26:2,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敞口,厚三角缘唇,斜弧腹,圜底,圈足。腹部饰绳纹,腹部下方饰一周凹弦纹。口径22.8、底径11.4、高约14.3厘米(见图11-2)。

陶罐 1件。M26:3,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侈口,卷沿,束颈,溜折肩,平底。素面。口径9.1、肩最大径15.6、底径8.6、高约15.2厘米(见图11-3)。

墓内出土陶鬲与《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第四期陶鬲97SCMM13:1相似,报告认为第四期年代约相



1.鬲(M26:1)2.簋(M26:2)3.罐(M26:3)

图 11 M26 随葬陶器

当于穆、恭王时期。^① 墓内出土陶罐与张家坡第三期 B 型 XIa 式陶罐 M371:1 相似,报告认为第三期年代相当于共懿懿时期。^②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M26 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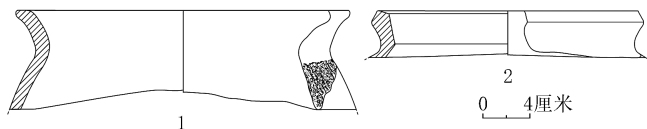
(四) 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墓葬

仅 1 座,M12。

M12 详细资料已经发表^③,现补充填土中出土的 1 件鬲和 1 件瓮的资料。

陶鬲 M12 填土:1,残,夹砂褐陶。侈口,尖圆唇,沿上有小平台,卷沿,束颈。颈部以下饰绳纹。口径 28、残高约 8.3 厘米(见图 12-1)。

陶瓮 M12 填土:2,残,夹砂灰陶。小直口微敞,斜方唇,矮领。口径 22、残高约 3.9 厘米(见图 12-2)。



1.陶鬲(M12 填土:1)2.陶瓮(M12 填土:2)

图 12 M12 填土出土陶器

(五) 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墓葬

共 13 座,分别是 M2、M6、M13、M15、M18、M23、M24、M27-M30、M33 和 M34。除 M15 和 M34 为灰坑葬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M13 位于 T2435 西南部,开口于第 3 层下,打破 H69、H89 及生土。墓向 180 度。墓坑口小,底略大。墓口距地表约 0.9、墓口长 2.51、宽 1.3 米;墓底长 2.68、宽 1.39,墓深 2.31 米(见图 13)。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较紧密。墓壁上较直,下部稍往外扩,熟土二层台,宽 0.13-0.21、高约 0.37 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 2.37、宽 1.21、高 0.37 米;棺长 1.87、宽 0.73 米,高度不详。椁盖板为东西横向铺设,可辨认出有 8 块盖板,每块长约 1.25、宽约 0.18 米(见图 14)。椁底中部有一椭圆形腰坑,长约 0.47、宽 0.28、深 0.16 米,腰坑内发现有骨末,可能为殉狗。椁底东、西两端各有一剖面呈半圆形横垫木,长约 1.35、宽约 0.14、厚约 0.02 米。棺内发现一具人骨,保存状况较差,仅下肢骨保存较好,墓主人骨头朝南,俯身直肢,面向不明,为一年龄 39-43 岁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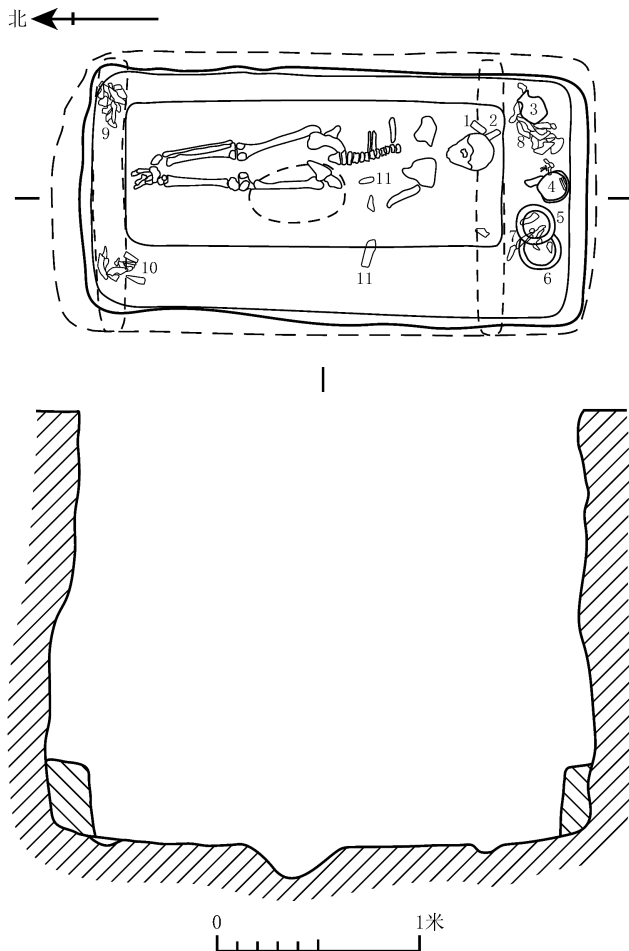
椁盖板南部放置两组羊腿骨、两个羊肩胛骨及一个羊头骨,应属葬牲行为(见图 14)。棺外四角出土有数件蚌鱼,可能为棺帷坠饰。在南部棺椁之间放置 1 件陶罐、2 件陶豆和 2 件陶盂。另外,在头骨右侧放置 2 件玉圭,在头骨附近还出土 8 枚贝,可能为口琫。在填土中还出土 2 件陶纺轮和 1 件卵石。

墓中共出土 172 件随葬品,其中陶器 7 件、玉圭 1 件、蚌鱼 155 件、贝 8 枚和卵石 1 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 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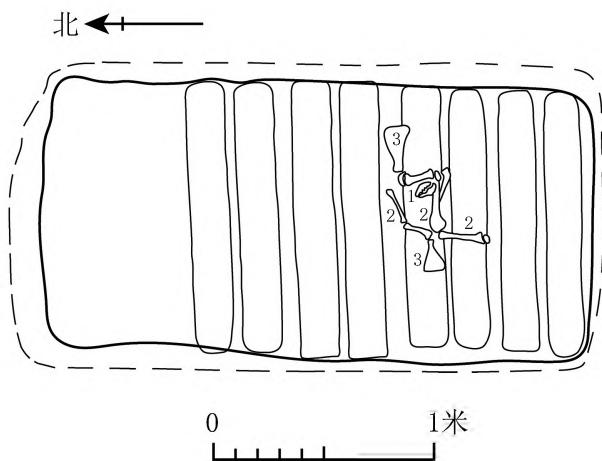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 357、368 页。

③ M12 详细情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 2020~2021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4 年第 2 期。本文只做简要概括,并补充资料,如已发表的资料与本文有不同之处,以本文为准。



1、2.玉圭 3.陶罐 (M13:6) 4.陶豆 (M13:7) 5、6.陶盂 (M13:8、9) 7-11.蚌鱼

图13 M13 平剖面图



1.羊头骨 2.羊腿骨 3.肩胛骨

图14 M13 椁盖平面图

陶器 共7件。

陶罐 1件。M13:6,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束颈,圆肩,斜弧腹,平底。肩部饰有两道凹弦纹。口径10、肩径13.3、底径7.5、高14.2厘米(见图15-5)。

陶豆 2件,均泥质灰陶。直口,方唇,浅盘,豆柄中空,圈足。豆盘外壁饰两道凹弦纹,豆把上饰两道浅凹弦纹。M13:7-1,口径约18、底径约11.7、高约12.5厘米(见图15-3)。M13:7-2,口径18、底径11.3、高12.8厘米(见图15-4)。

陶盂 2件,均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斜平宽卷沿,沿内折,束颈,圆肩,平底。M13:8,肩部饰三道凹弦纹,内壁有慢轮修整痕迹。口径21、肩径19.2、底径11、高13.4厘米(见图15-1)。M13:9,沿上靠外侧有一道凹槽。肩部饰三道凹弦纹。口径约22.6、肩径20.8、底径10.3、高14.8厘米(见图15-2)。

陶纺轮 2件,均扁圆形,中间有一孔。M13 填土:1,夹砂褐陶。素面。直径4.8、厚约1.5厘米(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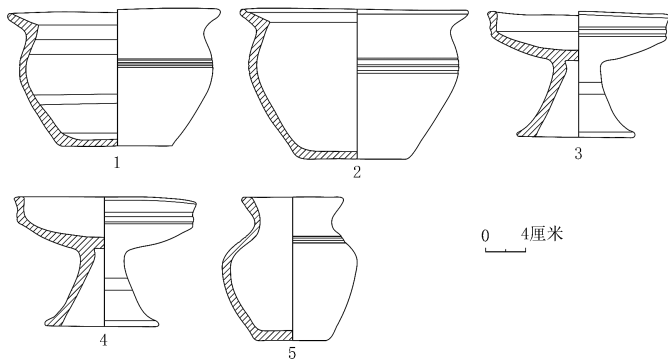
16-1)。M13 填土:3,夹砂灰陶。稍残。两面及侧面饰绳纹。直径约 5、孔径约 0.7、厚约 1.9 厘米(见图 16-2)。

玉圭 1 件。M13:4,稍残,青白色,残长约 15、宽约 3.3、厚约 0.35 厘米(见图 16-9)。

蚌鱼 155 件。分两型。A 型,115 件,“V”字形,一端有小孔,一端为尖尾。M13:10-1-1,长约 14.2、厚约 0.3 厘米(见图 16-3)。M13:10-2-1,长约 12.2、厚约 0.2-0.5 厘米(见图 16-4)。M13:10-3-1,长约 12.5、厚约 0.2-0.3 厘米(见图 16-5)。B 型,40 件,长条形,一端有小孔,一端为平齐尾。M13:10-4-1,长约 8.4、宽约 2.5、厚约 0.2 厘米(见图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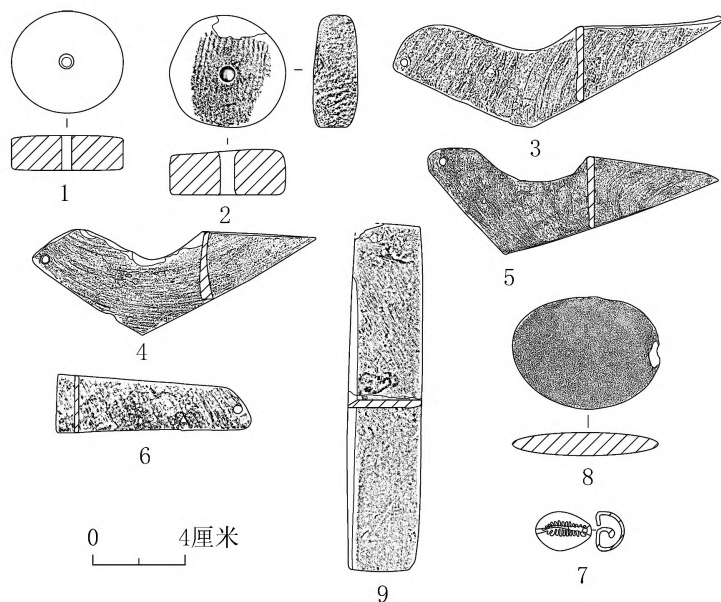
贝 8 枚。M13:11-1,背面有孔,长约 2.4 厘米(见图 16-7)。

卵石 1 件。M13 填土:2,稍残。扁圆形,青灰色。长约 6.3、宽约 4.8、厚约 1 厘米(见图 16-8)。



1、2.孟(M13:8、M13:9)3、4.豆(M13:7-1、M13:7-2)5.罐(M13:6)

图 15 M13 出土陶器



1、2.陶纺轮(M13 填土:1、M13 填土:3)3-6.蚌鱼(M13:10-1-1、M13:10-2-1、M13:10-3-1、M13:10-4-1)7.贝(M13:11-1)8.卵石(M13 填土:2)9.玉圭(M13:4)

图 16 M13 出土小件器物

出土陶豆与张家坡第五期 V 式陶豆 M91:1 相似^①;出土陶孟与张家坡第五期 IV 式陶孟 M304:05 相似^②,《张家坡西周墓地》认为第五期年代相当于宣幽时期^③。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M13 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M15 灰坑葬。位于 T2535 西北部,开口于 H65 第 4 层下,打破 H65 第 5 层和生土。墓向 76 度,是在 H65 废弃后的第 5 层堆积上挖建的。墓坑口大底小,墓口形状呈长条形。墓口距地表约 1.92、长 2.02、最宽 0.86 米;墓底长约 1.47、最宽 0.47、墓深约 0.79 米。东部墓壁呈斜坡状,南部有一小缓坡,西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 357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 354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 368 页。

壁和北壁较直,无二层台。墓葬为灰褐色填土,土质疏松,未发现葬具。发现一具人骨,保存情况较好。由于墓坑较小,骨架呈蜷曲状。头部因东侧墓壁倾斜而向内窝折。墓主头朝东,脸向上,上身稍往左倾,左臂垂下,左手放置于盆骨左侧,右手横放在左臂上,双腿向左侧弯曲,为一年龄 14-17 岁女性(见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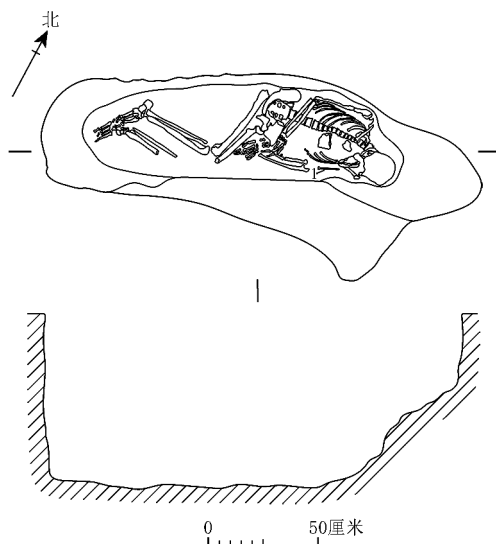


图 17 M15 平剖面图

在头骨西南部出土骨筭 1 件。骨筭, M15:1, 完整, 圆长条形, 顶部呈钉头形, 通体磨光。长约 16.7 厘米(见图 18)。

根据层位关系,因 H65 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故 M15 的年代也大致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M34 灰坑葬。位于 T1527 东北部,开口于第 3 层下,打破生土。墓向 180 度。墓葬的建造过程是先在生土上挖一个小坑,埋入人骨后再在人骨上覆盖夹砂褐陶疙瘩鬲片(见图 19)。陶鬲片后经拼接修复后,应为同一件陶鬲。墓口形状略呈长椭圆形,墓口距地表约 1.4 米,长 1.27、宽 0.46,深约 0.12-0.18 米,墓葬剖面略呈锅底状,中部偏南处最低。墓葬为灰褐色填土,土质较紧密,含少量红烧土颗粒。未发现葬具。发现一具人骨,头骨和部分肢骨保存较好。由于墓坑较小,头部略向左侧往内窝折,墓主头朝南,脸向上,仰身直肢,双手交叉放置于腹部,为一年龄 7 岁左右儿童,无其他随葬品(见图 20)。

复原出陶鬲 1 件。M34:1,残,夹砂褐陶。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微分裆,疙瘩足。腹部中间残缺。颈部以下饰绳纹。口径 35.4、腹径 35.7、残高约 35.8 厘米(见图 21)。

出土陶鬲与《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第五期丙类 A IV 式陶鬲张 M326:2 相似,《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认为第五期年代大致为西周晚期偏早,相当于厉王、共和时期。^①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 M34 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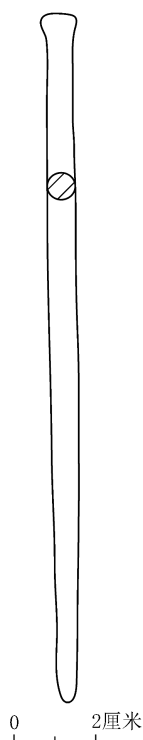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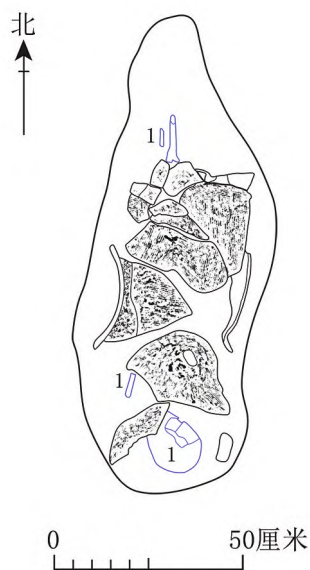


图 18 M15 出土骨筭
(M15:1)

^①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8、90 页。



(1.人骨)

图 19 M34 覆盖扁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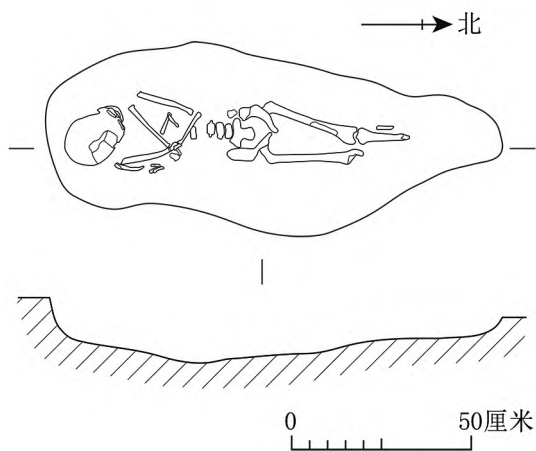


图 20 M34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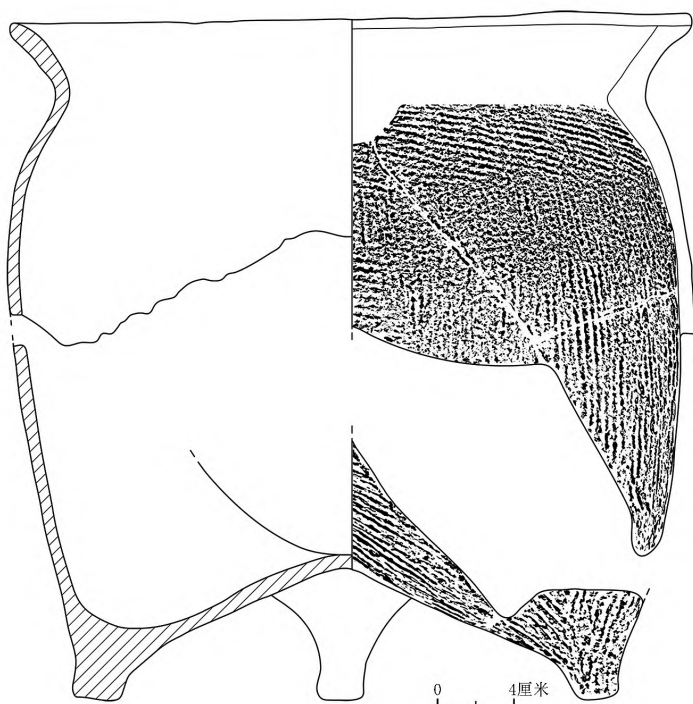


图 21 陶扁 (M34:1)

(五) 具体年代不明墓葬

共 11 座, M1、M4^①、M16、M17、M19-M22、M25、M31 和 M32,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6、M19、M22、M31 和 M32 等 5 座墓葬墓底有腰坑, 其余墓葬墓底无腰坑。出土有贝、蚌鱼等小件器物或无随葬品。

① 详情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沣西大原村制陶遗址 2017~2018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 年第 9 期。

二、墓葬形制和葬式等不同葬俗所见人群构成

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发现的31座墓葬中,除2座为灰坑葬外,余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29座竖穴土坑墓中,俯身直肢葬有M4、M6、M12、M13、M14、M16和M22等7座;仰身直肢葬有M1-M3、M10、M18-M21、M23和M31等10座;葬式不详有12座。在7座俯身直肢墓葬中,M6、M12-M14、M22等5座墓向朝南,M4墓向朝东,M16朝西,且这类墓葬之间均无打破关系,尤其是M12-M14这3座墓葬东西大致呈等距排列,似乎有所规划(见图2)^①。据不完全统计,在丰镐遗址内发现的西周墓葬中,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②1983—1986年张家坡西周墓地398座西周墓中,仰身直肢葬有242座,俯身直肢葬仅9座。^③在1967年发掘的张家坡162座西周墓葬中发现17座俯身直肢葬,属于发现数量较多的一次,其中墓向朝东的有8座,朝西2座,朝南和朝北的各2座。^④有学者认为,“包括墓向、葬式、墓型、殉牲、殉人、车马殉葬等方面在内的‘葬俗’与人群共同体的关联性最强,是识别族属、判断族源的有效标准,在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⑤。张明东认为俯身葬的葬俗不是姬姓周人的葬俗,采用俯身葬的墓主不能排除是殷遗民的可能。^⑥显然大原村制陶遗址内这些墓向多正南北向或正东西向的,且葬式为俯身直肢葬的墓主可能属于同一族群,其数量占比要比丰镐遗址群内其他遗址稍高一些。因此可以推测在制陶遗址内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的族群。

在29座竖穴土坑墓中,葬具为一椁一棺的有M10、M11、M13、M14、M19、M22-M24、M26-M30、M33和M35等15座;单棺的有M2-M4、M6、M16、M17、M31和M32等8座;无棺的有M1、M12、M18、M20、M21和M25等6座。另外,除M15和M34外,在制陶遗址内还发现在废弃的灰坑、陶窑以及水井埋人的现象,我们将这类现象也归为灰坑葬。这类灰坑葬有H7^⑦、H66、H76、H107、H111^⑧、Y19和J5^⑨。

在《礼记·檀弓上》《荀子·礼论篇》和《庄子·杂篇·天下》等先秦文献中对周代棺槨制度多有记载,但关于其具体形成时期和内容学者多有争议。赵化成认为西周至春秋早期是周代棺槨制度的滥觞期,而且“周代棺槨制度中,体现等级差别,最基本的莫过于棺槨重数”^⑩。故使用不同葬具的墓主应存在身份等级差别。年代大致与制陶遗址相同的一椁一棺的墓主可能为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或技术陶工,而单棺的、无棺的及灰坑葬的墓主则可能为底层陶工及其家庭成员。如M13墓室较大,一椁一棺,且墓内随葬有1件玉圭,墓主等级可能较高,可能为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M28墓内随葬有泥器和1件玉管,且M27、M28和M29、M30成组分布,方向、大小和形制相近,墓主身份可能为技术陶工。M12内仅随葬有1件夹砂褐陶分裆鬲,无棺,墓主则很可能就是底层陶工。我们通过对遗址和墓葬出土人骨的古病理学研究也印证了该遗址居民可能为制陶工人。^⑪所以,大原村制陶遗址内西周墓葬的墓主应由管理制陶生产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和底层陶工等多种身份的人群构成。

① 由于大原村制陶遗址不是全面揭露发掘,而是采用局部精细化方式发掘,所以发现的31座墓葬分布较广且相距较远。除早于制陶遗址的M3和M10等6座墓葬外,其余25座墓葬中,T0342中M27-M32等6座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其余墓葬则分布在制陶遗址其他遗迹之间。从时代来看,除具体年代不明的墓葬外其余均与制陶遗址大致同时,从葬俗来看,俯身直肢和仰身直肢的墓葬在制陶遗址各个区域内均有发现,故这些墓葬应属于与制陶遗址相关的一处墓地。

②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第118页表9。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附录一。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⑤ 梁云、安婷宇:《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江汉考古》2023年第6期。

⑥ 张明东:《商周墓葬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沔西大原村制陶遗址2017~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9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2020~202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4年第2期。

⑨ 付仲杨、徐良高:《陕西丰京大原村制陶作坊遗址2023年度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24年8月16日,第8版。

⑩ 赵化成:《周代棺槨多重制度研究》,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⑪ 陈靓等:《陕西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出土人骨的古病理学》,《人类学学报》2025年第1期。

三、文化融合现象

从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形制和葬式等不同葬俗可见该地居民由多种不同人群构成,而且还发现了多例墓葬存在多种文化因素的现象。

(一) M10 和 M11

两座墓葬的墓向均朝东,均为口小底略大竖穴土坑墓,北二层台上均有一名殉人,填土中和二层台上均有葬牲、椁底中部均有腰坑,坑内均殉狗,很可能属于同一时期的一组墓葬。^①在这两座墓葬中至少存在三种文化因素。

1. 关中地区周文化因素

M10 中周文化因素有:“毁兵”现象—折弯的铜戈;M11 中周文化因素有:关中西部周文化陶器—联裆鬲。

“毁兵”现象在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长安张家坡以及河南、山西、北京等地区的西周墓葬中都有发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特殊的葬俗。多位学者认为“毁兵”是周人的葬俗,应是西周初期进行整合的产物,反映了西周统治者的“礼治”思想。^②要二峰更是通过系统地梳理材料后认为“毁兵”葬俗是周族人自商人习得并发扬的礼俗;先周至春秋时期毁兵葬俗的流传变化,反映了周人吸收商文化因素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③M10 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故笔者认为可将该墓中“毁兵”现象视为周文化因素。

M11 出土联裆鬲属于周文化因素。张礼艳曾将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陶器与先周文化出土陶器做过对比,认为 M11D1:01 这类联裆鬲应源自于先周文化。^④

2. 戎狄文化因素

M10 中戎狄文化因素有:在填土中以马、牛的头、蹄祭祀,以羊葬牲的现象和随葬品中的带流陶罐。M11 中戎狄文化因素有:在填土以羊葬牲的现象和随葬卵石块。

所谓“戎狄”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西方和西北方的“非我族类”人群的泛称,应该包括不同文化、来源和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多个族群。西周时期位于周人西方和北方的有寺洼文化、与姚河塬西周聚落同时的周边文化、李家崖文化晚期和晋西北的“保德类型”铜器群等考古学遗存。其所对应的就是当时的戎狄族群及其创造的文化遗存。^⑤

头蹄殉葬形式是北方地区墓葬的特征要素,其分布范围在蒙古高原北部、西部,天山山脉北麓伊犁河流域等亚洲北部地区,可作为游牧民族丧葬行为的一种象征。在我国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东部甚至东北地区的墓葬中也多见这种殉葬方式。^⑥另外,M10 出土的铜戈(见图 8-1)也与灵台白草坡出土铜戈 M2:29^⑦非常相似。而灵台白草坡地处泾水诸国通往宗周的咽喉之地,是北方民族出入之要冲。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也与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着明显的联系。^⑧故头蹄殉葬形式同样可视为一种戎狄文化因素。

北方游牧民族在墓中埋葬动物种类也有偏好,以羊的数量居多,且殉牲数量要比中原文化因素的墓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南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0 年第 4 期。

② 王恩田:《沔西发掘与武王克商》,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5) 庆祝邹衡先生五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50-556 页;张明东:《略论商周墓葬的毁兵葬俗》,《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4 期;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4 期。

③ 要二峰:《商代墓葬中的“毁兵”现象》,见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 21 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 84-104 页;要二峰:《周代的“毁兵”葬俗》,见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 26 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52 页。

④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第 98 页图 23,2。

⑤ 徐良高:《西周时期周文化区所见西北戎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24 年第 1 期。

⑥ 刘羽阳、王辉:《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动物埋葬习俗——从埋葬头蹄的现象谈起》,《考古与文物》2017 年第 1 期。

⑦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⑧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92 页。

葬要多。^①但有的学者也认为墓内用牲属于殷人的葬俗,如马赛认为“有殉牲的墓,很可能也是随着灭商以后大量殷遗民涌入关中地区而出现的”^②。尽管在殷人墓内确也有多用牲现象,但“全牲以狗为主,局部牲体多为牛、羊、猪^③”等。故在填土以羊葬牲,尤其是以整羊作葬牲的现象可视为一种戎狄文化因素。

M10出土的带流陶罐M10D1:01(见图8-2)与周文化的陶罐风格迥异,而与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新疆察吾乎沟口墓地^④出土的带流陶罐十分相似,但因两地相距甚远,该陶罐未必一定源自于新疆。如从整体风格看,其与西北寺洼文化^⑤的素面陶罐颇有类似之处。故带流陶罐也可视为一种戎狄文化因素。

另外,M11随葬石块的葬俗也可视为一种戎狄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用白石随葬的现象是羌族的一种白石崇拜遗俗,可能源自于西北氐羌先民。^⑥我们在西北甘青地区的寺洼文化^⑦和齐家文化^⑧墓葬中就多见随葬砾石和石块的现象。

3.殷商文化因素

M10和M11中殷商文化因素有:墓内殉人和腰坑殉狗。

周人墓葬中一般少见殉人^⑨,而商人贵族墓葬流行殉人,殉人一般置于二层台上、棺椁之间及墓道中,殉人的数量又与墓葬等级密切相关。^⑩在墓内设腰坑殉狗也是商人墓葬中常见的葬俗,自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流行,至晚商时期,殷墟遗址中已有近半数墓葬设有腰坑,尤其是等级较高的墓葬几乎都有腰坑,通常认为是殷人墓葬的传统。^⑪故雷兴山等将墓内殉人和墓葬设腰坑作为判断是否为西周殷遗民遗存的两条标准。^⑫笔者认为墓内殉人且同时有腰坑殉狗现象可视为殷商文化因素,因为单纯的殉人或腰坑殉狗,非殷人也有使用。

(二) M35

在M35中也存在三种文化因素。

1.关中地区周文化因素

M35中周文化因素有:铜觶和铜爵的铜器组合;随葬的联裆鬲和小口圆肩罐。

商代墓葬中通常都以铜爵和铜觚随葬,而西周早期关中周人墓葬中则多以铜爵和铜觶随葬。这种组合形式多见于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的周人墓葬中,如1967张家坡M16和M28^⑬、1960年周原M8^⑭以

① 刘羽阳、王辉:《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动物埋葬习俗——从埋葬头蹄的现象谈起》,《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习俗比较》,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② 马赛:《聚落与社会——商周时期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3页。

③ 雷兴山等:《西周殷遗民族属判断标准简论》,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13)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⑥ 沈仲常:《从考古材料看羌族的白石崇拜遗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沈仲常、黄家祥:《白石崇拜遗俗》,《文博》1985年第5期。

⑦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见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3)》,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47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

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⑨ 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42页。

⑩ 郅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⑪ 郅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74页。

⑫ 雷兴山等:《西周殷遗民族属判断标准简论》,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13)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第362、363页。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⑭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12期。

及马王乳品厂 97SCMM4^①等。

M35 随葬的高领联裆鬲和小口圆肩罐是丰镐遗址周人墓葬中常见陶器。张礼艳还将 M35 出土的这类高领联裆鬲和小口圆肩罐看作是西周文化因素。^②

2. 戎狄文化因素

M35 中戎狄文化因素有：墓内所随葬的陶簋。M35 出土陶簋 M35:3 和甘肃西和栏桥出土的陶簋 M6:12^③ 非常相似。张礼艳将它视为寺洼文化因素。^④ 如前文所述，M35 出土陶簋应归为戎狄文化因素。

3. 殷商文化因素

M35 中殷商文化因素有：设有腰坑和随葬仿铜陶尊。

仿铜陶礼器主要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至战国时期，自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萌芽，至殷墟四期大量出现，西周中期数量较多，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数量较少，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秦汉以后逐渐消失。随葬仿铜陶礼器可能是商代习俗的延续。^⑤ 马赛认为西周时期仿铜陶礼器是铜器的明器化现象，周人墓地倾向于使用铜明器，殷遗民墓地更多使用仿铜陶礼器。^⑥ 故随葬仿铜陶尊可视为殷商文化因素的表现之一。

除了上述三座墓例外，还有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葬 M26 以及具体年代不明但墓底有腰坑的 M16 等墓葬也至少存在周文化和殷商文化两种文化因素。

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位于西周都城遗址——丰京遗址西南部，其文化属性应属于关中周文化。如同前文提到的毁兵葬俗是由周人吸收商文化因素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一样，无论上述墓例的墓主是戎狄、殷遗民，抑或是周人，都说明了周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了戎狄文化和殷商文化等文化因素，并使之成为了周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周文化是在不断融合不同族群及其文化过程中成长的，表现出明显的包容性。^⑦

四、墓葬所见多元人群与等级差异体现的生产组织模式

在以往的认知中，晚商及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组织模式是家族式的，东周以降，手工业者的家族组织逐渐变得松散。^⑧ 手工业生产者大多以血缘为系联，组织在一起。在先秦文献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如《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于给官，族乡不别，不可以入惠。”^⑨《国语·齐语》曰：“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⑩《考工记》曰：“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⑪由此可见，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的手工业者具备“世工世族”性质，即以家族为单位，进行某种特定的手工业生产。

如前文所述，与大原村制陶遗址大致同时的墓主可能就是当时从事制陶生产的管理者或陶工。然而这些墓葬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与等级差异，显示墓主明显不属于同一家族，甚至不属于同一族群。那么，就需要一种力量将这些不同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作坊中大规模生产种类单一的产品，这就是大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 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②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第 98 页。

③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1987 年第 8 期。

④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第 105 页图 26。

⑤ 朱容婧：《两周时期仿铜陶礼器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14 页。

⑥ 马赛：《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群构成情况研究——以墓葬材料为中心》，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8 卷，文物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51 页。

⑦ 徐良高：《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见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05-618 页。

⑧ 林森：《商周时期“百工”研究》，《史学集刊》2014 年第 1 期。

⑨ 黄怀信等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73-174 页。

⑩ 徐元浩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 220 页。

⑪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 3114 页。

村制陶作坊的“统一管理的官营属性”^①。而这种由权力统一管理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并非由血缘所维系,在西周中、晚期就已经存在,是与《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所载“世工世族”不同的一种形态。

结 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大原村制陶遗址内与制陶遗址大致同时的西周墓葬的墓主可能为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和底层陶工。他们的来源复杂,一方面可能由多种身份构成,另一方面或许还来自于不同的族群。

同时,多例墓葬中存在多种文化因素现象充分表明了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周文化在传承和吸收中原殷商文化的同时,还将西北地区戎狄文化融合进来。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的多元文化面貌,是华夏族群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之缩影。

此外,大原村制陶遗址还呈现出一种至迟于西周中、晚期已经存在的,由权力统一管理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它并非由血缘维系,与《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所记“世工世族”存在差异。

附记:大原村制陶遗址墓葬中出土人骨均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等鉴定,在此致谢。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Fusion: Evidence from Western Zhou Tombs at the Pottery Workshop Site of Dayuan Village, Fengjing

FU Zhongyang XU Lianggao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etween 2017 and 2023, 31 tomb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 11th century-771 BC) were excavated at the pottery workshop site in Dayuan Village, Fengjing. The burial complex comprises 29 vertical pit tombs and 2 ash pits, exhibiting diverse mortuary practices including prone and supine straight limb burials. The tomb structures vary in complexity, with 15 featuring double-coffin arrangements, 8 with single coffins, and 6 without coffins. Distinctive ritual elements include head-and-hoof burials, dog sacrifices in waist pits, human sacrifices on secondary platforms, and various animal offerings. The tombs reveal a social hierarchy encompassing various groups, including low-ranking aristocrats managing pottery production, skilled potters, and general laborers, likely representing multiple ethnicities. Evidence of multicultural practices in several tombs underscores the Zhou Dynasty's role in a broader cultural synthesis, maintaining the dominant tradition of indigenous Zhou practices, inheriting traditions from the Shang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incorporating influences from the Rong and Di peoples of the northwest. This fusion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uaxia and other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exemplifying a process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stratified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se tombs suggests a specialized, non-hereditary craft production system, managed by centralized authorit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the “family-based” artisan model described in pre-Qin texts like *Kao Gong Ji* (*The Artificers' Record*).

Keywords: Western Zhou Dynasty; tombs; social composition; cultural fusion

[责任编辑 孙晓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 2020~2021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4 年第 2 期。